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库

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

中共创立掀起革命洪流

1921—1927

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组织编写

首席专家 张静如

李颖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

中共创立掀起革命洪流

1921—1927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 张静如

李颖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创立掀起革命洪流 : 1921 ~ 1927 / 李颖著. —
北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6

(中国共产党辉煌 90 年)

ISBN 978 - 7 - 5300 - 0322 - 0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
1921 ~ 1927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7590 号

中国共产党辉煌 90 年

中共创立掀起革命洪流 1921—1927

ZHONG GONG CHUANGLI XIANQI GEMING HONGLIU 1921—1927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 张静如

李 颖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7.25 印张 309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0 - 0322 - 0

定价: 47.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文库》

编 委 会

主 任 傅 华 史秋秋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力 史秋秋 曲 仲 刘陈德 李翠玲

张静如 陈之昌 姚 桓 崔新建 傅 华

总 前 言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90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90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辉煌成就的90年，是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不断发展壮大的90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策划、组织、编写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库》，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中国共产党建设90年》和《90年中人与事》三个系列，共18种作品近700万字。《文库》旨在从党史、党建和奋斗中的共产党人三种不同视角，反映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文库》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点出版物。

为做好《文库》的组织编写工作，确保《文库》及时、高质量地出版，成立了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傅华和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史秋秋为主任的《文库》编委会。编委会组建伊始，就对《文库》的编写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和学术规范，强调书稿撰写要有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基本史实、基本观点准确，既要体现近年来研究的新材料、新进展，又要有新视角、新观点，以确保《文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知识性，将《文库》打造成精品。《文库》的编写组织工作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我们聘请了党史、党建领域的著名学者张静如、姚桓、刘陈德分别担任《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中国共产党建设90年》、《90年中人与事》的首席专家，负责对具体选题、作者队伍、内容框架以及时间进度把关，并负责最后统稿、定稿等工作。这三位首席专家既是组织者，又是作者中的一员。他们尽职尽责，不辞辛

苦，付出了大量心血。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或工作之余，认真研究，勤奋写作，保证了书稿的按时交付。《文库》或许还未臻完美，但确是作者潜心研究和深入思考的成果。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对《文库》的编辑出版高度重视，给予了指导和支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办公室不仅具体承担了《文库》的策划、组织、统筹协调等日常工作，还为《文库》的撰写和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北京出版集团领导和该集团人文社科图书出版事业部的编辑团队，为《文库》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在《文库》即将付梓之际，我们对上述单位的同志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们期望《文库》能够为党史知识和党建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普及发挥应有的作用，期待广大读者对《文库》给予批评指正。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文库》编委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导 论

张静如

一、中共历史学是历史学科

什么是中共历史学？所谓“学”，就是独立的学科。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历史过程，而中共历史学则是研究这一历史过程的学科。因此，凡是研究这一历史过程的课题，不管从什么角度、什么层次，都属于中共历史学的范围。研究人物是，研究事件也是，研究理论问题还是，就算考证一次会议的时间或地点这样的小事，同样应归于这个范围之内。

中共历史学是中国历史学的组成部分，是近现代时限内的一部专史，属于中国政党史的分支学科。因此，毫无疑问，中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应为历史学科。从理论上说，凡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是整体的、断代的或分类的，都应该归属于历史学科。作为纵向学科的中共历史学，当然是历史学科。

本来中共历史学属于历史学科，不应该成为问题，可自1958年这门学科被列入高校政治理论课之后，人们就产生了错觉，误以为它是政治学科，再加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把中共历史放在政治学下面，更使这种错觉固定化。确实，从课程的作用来说，既然中共历史学被列入政治理论课，那就应该起这方面的作用，但这不等于说中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也随之改变。哲学、政治经济学早已被列入政治理论课，可谁也没有认为这两门学科的性质改变了。一般说来，课程作用和学科性质是一致的，特殊情况下，两者也可以不相同。人们没有注意到，高等学校历来都以不同时期对学生进行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为标准，来选择恰当的学科充任政治理论课，但被选入的学科的本来的性质并不因此而改变。人们也没

有注意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编制学科目录时，由于不明确中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认为它既然是高校的政治理论课，而历史系又没有开设这门课，那就放在政治学下面作为二级学科。这两方面情况认识不清，自然会造观念上的误差。这种误差，非常不利于中共历史学按照自身规律发展。学科性质问题，是一切研究的前提，摆错了位置，就会走上歧路。

中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至今仍有不同说法。比如，有人说它既是历史学科，也是政治学科；也有人说它是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当然，个人认识不同，不必强求一致。不过这些说法不科学，值得商榷。把中共历史学说成是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显然弄混了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学科性质是指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属性，一般说来这种根本属性只有一种，交叉学科可以有两种；学科特点则不具有这种属性，它可以有一个或许多个，也可以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所共有，不过表现出强弱的差别。比如，政治性不仅中共历史有这个特点，其他社会学科也有，但有的强些，有的弱些。其实，中共历史学不仅政治性强，而且理论性也很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每前进一步都带有政治性，或者说它的每一活动都是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使社会获得长足进步服务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任何历史现象，无不受到政治的影响。可见，中共历史学政治性强的特点非常明显。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视理论建设和用理论指导实践。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立的。可见，中共历史学理论性强的特点也非常明显。总之，学科性质与学科特点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应该把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放在一起表述，更不应该把学科特点当做学科性质。

如果说在党史界内部学者容易弄混中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那么在党史界之外的学者中则常有部分人不承认中共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形成这种认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易于使人误解。一种情况是史料不足，研究不够，写出来的内容不能完全符合历史实际，随着史料的挖掘、研究的深入，自然要重新改写；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受到认识上或政治上的影响，在研究中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写出来的内容与历史实际有差距，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更甚，改革开放后逐渐发生变化，很多问题得到重新评价，所用史料也更接近历史实际。这两种情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历史可以改来改去，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权力篡改历史，某些海外出版物不负责任地乱用史料和坚持错误视角的影响，从而使一些人得出中共历史学不是科学而是宣传材料的结论。外界

的这种认识当然不对，但责任主要在我们学界。虽说这与一定的政治环境有关，但即使在客观条件变好的时候，我们往往也没有能做得更好。

中共历史学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历史学是探讨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过程的内在客观规律的学科，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之前，历史学家们受唯心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使历史学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① 这话当然不是说别的学科都不是科学，而是说明由于他们创立了唯物史观才使历史学真正成为科学。作为中国历史学组成部分的中共历史学，是探讨近现代时限内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及指导思想发展全过程的内在客观规律的学科。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确凿的第一手材料为根据，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史学史、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校勘学、地名学、笔名学为辅助，力求揭示中共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规律。这样的一种学科，显然是科学的。的确，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当然应该对干部群众进行党史知识的教育和宣传，但这种宣传、教育要以党史研究的成果为基础，如果有违背历史实际之处要改正。不过，宣传、教育部门与研究部门往往有脱节之处，前者缺乏研究，认识上容易滞后于研究部门的新成果而出现误差。这种情况的存在，不能当做断言中共历史研究不科学的根据。

中共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长期被研究者忽略的问题，研究对象是学科研究的客体，由于研究的客体不同，即所研究的客体有自身的特殊性，才区分开不同的学科。对此，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得很明白：“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学科的对象。”^② 所谓弄清楚研究对象，就是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否则，文不对题，离题万里，劳而无功。许多学科都十分重视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以此为研究的起点。可是，中共历史学界对此却很不注意。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界的研究者才重新提出应该确定中共历史学的研究对象。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就表述过中共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他说：“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③ 毛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0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东的说法十分中肯，对确定中共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很有帮助。中共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这样表述：“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壮大及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全过程。”

研究对象决定研究内容，中共历史发展全过程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即中共自身建设史、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史。两个方面都要研究，不可偏废。在中共自身建设方面，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过几种著述，200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又出版了高新民、张希贤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但总的来看，还是比较少，研究的基础还比较薄弱，特别是不同领域的党的建设史还是少见。显然，这方面还需要加强。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史，多年来有许多研究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中，在史料的挖掘上、研究水平的提高上、研究领域的扩展上都有了极大的收获。但是，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史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的研究非常薄弱，以至在通史型的中共历史著作中见不到一般共产党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的身影。“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共历史书上，见到最多的是毛泽东的名字，个别地方可以见到孙中山、李大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名字，其他能够见到的多是党内外反面人物。“文化大革命”后，逐渐有了很大改观。比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写到新文化运动时，除李大钊外，还加上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沈尹默；写到中共一大时，13 个代表的名字都在上面。人名确实比以前多得多，该书中的党内外及国外正反面人物共计 973 个。但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仍均属于精英。当然，书中并不是完全没有说到群众，不过都是形成运动时才写，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凡是没有形成运动的与革命斗争关系不直接的不同群体的作用，则上不了书。我不是说，写中共历史不要写精英。精英一定要写，特别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个别领导人的活动一定要突出写，但在写精英的同时也必须写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的作用。否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精英人物确实起着重要作用，没有精英人物的先知先觉，没有精英人物带领群众前进，就不能推动历史发展。但是，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精英人物的活动则一事无成。所以，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中共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也说明，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执政后的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一切决策，都是靠着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贯彻执行，才能推动社会前进的。比如，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引进新思潮，先提出“民主”与“科

学”口号，随后又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写文章，在大学里讲课，当然对当时的人们接受新思想有作用。但先进分子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不可能太大，而要使更多的人接受新思想，至少要考虑到当时大中小学教师群体中赞成新思想的大多数人在课堂上传播新思想的作用。这些人都是普通的教师，不是教师中的精英人物，正是他们这个群体所起的传播新思想的作用，才使他们的学生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或者直接参加革命，或者支持和同情革命，或者以新思想为指导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作出贡献。无论何种情况，都能促进社会发展。又如，甲流一度横行，中央决策进行防治，靠谁来贯彻执行呢？当然要靠各级政府，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但真正为落实起直接作用的，一是大中小学学生群体，因为这种传染病的易感人群是青少年。由于广大学生群体提高了认识，积极注射甲流疫苗，就立起了一道屏障，使甲流传播率大大下降。二是医务工作者群体，他们奋斗在第一线，努力防止传染源的扩散，努力医治已感染病人，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特别是中医群体使用中药，疗效更佳。这样的群体作用的例子非常多，举不胜举。总之，精英作用和民众作用，两个方面都讲全，就更符合历史实际。以往对群体研究很不足，应该深入研究。可研究的群体多得很，比如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人力车夫群体，大革命时期北洋军阀群体，内战时期地下工作者群体，抗日战争时期文艺工作者群体、自然科学工作者群体，土地改革中富农群体，合作化运动中中农群体，“三反”、“五反”运动中私营工商业者群体、政府工作人员群体，思想改造运动中高校知识分子群体，“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体，改革开放后哲学社会工作者群体、环卫工人群体、出租车司机群体，“非典”时期的医务工作者群体，等等。考察群体作用，要注重群体的合力作用。这种作用是在群体的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相互补充也包括相互削减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考察群体的作用，是很不容易的。它不仅要有大量的史料为依据，而且要多角度、多层次进行分析，然后加以综合研究。比如，某一群体的整体心理状态，该群体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该群体的经济基础、政治倾向、文化素质，该群体的社会地位和任务，该群体的一般的和特殊的贡献，该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等等，都要仔细考察。

二、中共历史研究体系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研究体系。就是说，它的研究是多角度、多层次的，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中共历史研究，也是这样。对中共自身建

设史和中共领导的革命建设史的研究所形成的体系，总的来说，与历史学研究的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又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通史类：描述、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党自身建设的历史。它是对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理论诸领域进行活动以及在活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成绩、缺点的全面、系统、综合的考察、总结和研究。它可以使人们了解、认识中共历史发展过程的全貌，对发挥中共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作用极大。这方面研究水平的高低，反映中共历史整体研究的深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就是通史类的著作。以往高校、党校、军校分别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材，如何沁等编著的《中共党史讲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等，也都属于此类。

第二，断代史类：把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按时间顺序分为若干阶段进行研究。这方面研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延续时间长，包括内容很多，且不同阶段又有其特殊性，分阶段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从大阶段来说，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这三个阶段下面，又可以分成小的阶段，如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等等。彭明著《五四运动史》、邵维正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席宣和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张静如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萧一平和郭德宏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全史》、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罗平汉著《土地改革运动史》、齐鹏飞和杨凤城主编的《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10—2004.10）》、陈莉主编的《中国改革开放史》等，均属于此类。

第三，专史类：对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理论诸领域的活动，以史的发展线索分别进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涉及社会生活诸领域，而且有的领域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如军事领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活动领域，没有长期的武装斗争，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又如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活动领域，没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及艰苦的工作，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绩。再如理论领域，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活动的灵魂，没有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顺利发展。可见，要使中共历史研究深入，不分别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

活动是不行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专史类研究占有很大分量，不但社会生活诸领域内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要分别研究，而且每一领域里还有很多层次的问题要研究。属于此类的著作，如金春明、陈登才主编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李曙新著《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史》，姜华宣、王德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宋春、刘志超主编的《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史》，王功安、毛磊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通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陈文斌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定宜庄著《中国知青史》，陈丽凤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21—2006）》，潘晔著《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变迁与创新》，任杰著《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郑师渠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李洪河著《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武力和郑有贵主编的《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等等。

第四，地区史类：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按地区以史的发展为线索分别进行研究。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都是分地区进行的，或一省一市一县，或几省几市几县。由于中国地域非常大，各地区自然条件、人文条件及历史条件不同，发展不均衡，有快有慢，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地区史是中共历史研究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属于这类著作的有：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历史》，吴家林、谢荫明著《北京党组织白区斗争史》，宋金寿主编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唐正芒等著《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居之芬著《1933.9—1945.8 日本对华北劳工统制掠夺史》，黄美真主编的《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王友明著《解放地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著《广西剿匪记》，洪卜仁主编的《厦门60年纪事》，等等。

第五，行业史类：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按行业系统以史的发展为线索分别进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各个历史阶段，也通过不同行业系统进行，如铁路系统、纺织系统、金融系统、学校系统等。各行业系统党的工作有自身的特点，也是深入中共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张大中主编的《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李代耕编著《新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略》、周良书著《高校中共建设史》、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近代上海金融组织研究》、闫安著《大陆台商政策研究（1979—2005）》、房功利等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60年：1949—2009》、朱英和魏文享主编的《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卢勇著《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中国近代学术职业化进程研究》，均属此类。

第六，人物志类：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党内外各行各业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分别进行研究。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且有影响的人物甚多，所以人物研究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占有的分量相当大。这类成果有：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章学新主编的《任弼时传》，程中原著《张闻天传》，黄真、朱乔森著《李大钊传》，朱成甲著《李大钊传》，于永波主编《彭德怀传》，刘家泉著《宋庆龄传》，任建树、唐宝林著《陈独秀传》，祝彦著《晚年陈独秀（1927—1942）》，宋镜明著《李达传记》，库恩著《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黎辛、朱鸿召著《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佟静著《抗战中的宋美龄》，陈清泉著《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等等。

第七，研究性回忆类：一般性回忆不是研究成果，当然不包括在研究体系之中，但却有一种回忆是在研究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回忆不但有回忆者提供的亲身经历，有第一手材料提供的历史事实，而且有回忆者对历史问题的见解。它在中共历史研究中有重要作用，确实不可缺少。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龚育之著《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唐筱菊主编的《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陈铁健整理的《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郭德宏和林小波著《“四清”运动亲历记》、张颖著《外交风云亲历记》，属于此类。

第八，基础理论类：指导中共历史研究的理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但在实际研究中，仍需要一种中介理论，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历史研究的实际结合起来。同时，帮助在研究中如何掌握和运用史料的史科学、总结研究经验教训以提高研究水平的史学史，也都是中共历史研究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方面已有的成果，如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张注洪著《中国革命史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述论》，张静如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周一平著《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中共党史文献学》，田子渝主编的《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郭德宏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王炳林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张巨成编著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党史研究》，杜玉芳著《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梁怡和李向前主编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等等。

三、中共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

在当代中国，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每一门学科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的中介理论。比如，教育学有教育理论、社会学有社会学理论、政治学有政治学理论，等等。上面提到，中共历史研究也同样要有一个中介理论，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历史研究的实际结合起来。建立中介理论，要具备几项要求：第一，这个中介理论要成体系，即能够系统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应用，而不是反映某个原理，也不是仅仅应用于中共历史研究的某一方面。第二，这个中介理论要有可操作性，即可以列出条目，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应用，特别要避免把理论艰涩化，避免使用费解的语言和难懂的概念，使人无法运用。第三，这个中介理论要有时代性，即要与不同时代的历史实际结合，以便于指导中共历史的研究。建立中介理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熟悉中共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这个中介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可以做如下表述：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以群体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佐。

对于这个中介理论体系，需要说明几点：

第一，为什么强调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它的道路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其手段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中国共产党历史过程的主线，应该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解放生产力为主线。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用武装斗争的办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以解放生产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以解放生产力为主，并不是说生产力没有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一定阶段里得到发展。这是因为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每一小的革命阶段的胜利结局都会多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在革命势力所长期占领的较大的局部地区，生产力无疑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进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以解放生产力为主线。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

制度，以继续解放生产力的过程。由于政权已掌握在人民手中，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提到了重要位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仍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但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继续清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障碍，不断进行改革。改革也是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生产力要紧密与社会改革相结合。三个大阶段一个目的，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2 周年的讲话中说：“我们党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七十二年的战斗历程。这七十二年，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始终站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前列，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历史不断进步。在前二十八年，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通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来，我们党一直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顽强探索，其间虽几经曲折，终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通过实行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在新的条件下实现新的解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纵观七十二年的历史，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独立和走向繁荣富强，归根到底是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密切相联的。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① 这段话准确地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和主线。弄清楚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就要注意围绕这一主线开展研究，特别应该注意如何使中共历史的主体部分和重点部分的研究体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内容。同时，还要注意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为标准，衡量政党、群体、个人的历史作用，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

第二，为什么要强调以社会史为基础？道理很简单，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都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进行的，那么，考察这个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的部分，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社会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是动态的具有复杂相互关系的人群结构。研究社会，必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6 页。

方式，等等。总之，研究社会，就要研究物质的和精神的的社会生活诸方面。所以，研究社会史，也就是研究社会生活诸方面之史的演化和变革。这样，社会史的对象，应该说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其研究范围极为广泛。以社会史为基础，就是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近现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说得好：“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① 如在中国，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谁来革命，如何革命，革命的目的，建设的出发点、道路、方针、政策和前景等问题，都需要从近现代中国社会生活诸方面去解释。仅仅说明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就要研究很多问题。诸如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思想特征及其变迁、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及帝国主义入侵的影响、近代中国新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及其与旧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变迁、近代中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特征及其变迁，等等。要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特点，除了必须研究上面列出的问题之外，还应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特点，研究近代中国民主传统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研究中国近代政党的演变，等等。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研究，不能不涉及近代中国农村的变化、农民阶级与地主的关系、中国农民的心理状态、农村的家族制度和血缘关系、宗教在农村的影响、农村文化及教育状况、苏区工商业发展状况等诸多问题。研究白区工作更是复杂，现代城市中的一切问题都与之有联系。如地下工作机关的设置地点，必须考虑城市的地理环境、人际关系，而其工作方法又常常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有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考察影响中国共产党所处近现代中国社会不同领域的众多因素，是一件艰难的复杂的事。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共历史研究得到深化，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不是说中共历史上的任何一件小事，都要进行如此的全面研究。因为许多小事，比如一次小的战斗、一次影响很小的罢工之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这样细致的分析。另外，即使大的问题，也要选择与此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生活一个或几个领域，进行重点分析。

第三，为什么不把阶级分析方法与阶级斗争理论单列出来考察？理由是这种理论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内容派生出来的，它本身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